

• 重大主题专栏 •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三农学推进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朱信凯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三农”发展实践的典型经验愈发清晰、理论内涵愈加凸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谓正当其时。面对当前农经研究旨趣及议程相对分散、中国经验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水平有待提升的挑战，建构三农学，是应对上述挑战、揭示中国经验本质内涵进而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三农学具有三项关键特征：其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更加完备的分析性范畴体系，形成关于中国“三农”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判断；其二，突破西方农经缺乏历史维度的局限，涵纳对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和变迁动力的研究，明确中国“三农”发展的历史方位；其三，强调学理体系的层次性，以兼容和吸收不同研究范式的有益内容。建构三农学，不是要以三农学替代现有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而是以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启发研究视角、以中国“三农”旨趣设置研究议程，引导和助力中国农经学科走向有意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

关键词：三农学 自主知识体系 范畴体系 学理层次

中图分类号：C01; F30; F32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习近平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这一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无法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传承，无法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做出直达本质的分析和判断，也无法为讲好中国故事、探索中国经验和展现中国智慧提供最贴切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发展实践的典型经验愈发清晰、理论内涵愈加凸显，国内学者对于世界学科前沿的把握愈发深入。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系统化，形成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谓正当其时。

[资助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农民现代化与农民发展理论创新研究”（编号：2024JZDZ062）。

[作者信息] 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电子邮箱：zxk@ruc.edu.cn。

^①参见《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关于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经济学领域，有学者指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将理论还原于实践情境，并在实践情境中建构理论。以问题导向和独立研究议程为代表的自主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价值取向，以及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构造，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孙圣民，2023）。在社会学领域，有学者提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是要直面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敢于打破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知识霸权（冯仕政，2022）。在哲学领域，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孙正聿，2023）。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文中简称“农经学科”）虽然与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所不同，但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上存在一定的共性。正如高培勇、魏后凯、何秀荣、青平、姜长云、周应恒等专家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上对建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判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重视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高培勇等，2024）。

诚如众多学者所言，建构农经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关注中国问题、重视中国实践。笔者认为，在经验的来源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上，若要直面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形成回应中国需求的研究议程，必须从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运行基本逻辑的深刻、系统把握，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范畴及框架指引。其中，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在农经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中，范畴能够为刻画“三农”相关的社会运行与变迁的规律提供参照。框架则是在范畴的基础上，将诸多研究主题整合起来的逻辑系统与理论体系。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积淀，而“三农”领域恰是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领域。中国以农耕文明莫立其根基，数千年来，“三农”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中国朴素的价值理念，也蕴含并传承于农耕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这些价值理念所引导的中国问题，正是农经自主知识体系在研究议程设置中所关注的内容。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既是反映社会变迁和转型最为突出的领域，也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创新最为丰富、最为系统的领域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为目标，“三农”仍具有全局重要性，依然是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沃土。

然而，与“三农”的重要性及其实践的丰富性所不匹配的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在“三农”领域的重要科研力量——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及该学科的学者，虽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绩，但研究旨趣和研究议程依然相对分散，中国经验的系统化提炼不够突出。这导致到目前为止，在形成中国主体性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方面，农经学科的现有研究依然有所欠缺。具体来说，农经学科在针对中国“三农”实践典型经验进行本质性提炼方面的工作存在不足，未能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叙事，也尚未厘清具体如何在学科内围绕“两个结合”开展未来的科研实践活动。农经学科推进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笔者认为，当前农经学科到了再出发的时候，需要对发展方向、学理内涵、研究范式进行全新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无法思考中国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三农”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领域所出现的重大问题。在笔者看来，农经学科再出发的关键，是在已有几十年学科积累和广泛吸收世界学术前沿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三农”实践经验与中华文明哲学特质，建构三农学。以三农学为切入点，形成能够揭示中国“三农”发展与实践本质内涵、具有充分研究议程与研究范式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为什么需要三农学：农经学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性

（一）农经学科的发展历程

农经学科是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唯一以“农”为主题的一级学科。“农经者，农立国本、经世济民。”^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农经学科评议组为该学科所撰写的介绍里，明确了农经学科是一个研究领域涵盖经济、管理、社会乃至相关自然科学、生产知识的综合性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经学科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农经学科主要是在模仿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研体系的基础上发展的。中国农经学科的主要教材，具有浓厚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色彩。在这一阶段，中国农业经济学教研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计划经济下的“三农”建设。应当说，农经学科的发展受益于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介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农经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的农场经济分析、农场经营理论，视野较窄，而且和中国在细碎化土地上、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经济现实脱离甚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的协作与分工等）和基本视角（如从参与国民经济所发挥的功能、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农业农村问题等），带来了西方农场经济分析所不具备的宽广视野。然而，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农经学科的发展也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作为模仿对象和提供主要分析框架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本身具有较大的教条主义色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一国现实有机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尚在探索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三农”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本质特征，学术界也尚未形成足够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经学科的发展逐渐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农经学科转为以引进西方（尤其是美国）农业经济学教研体系为主。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农经学科仍主要是在这一体系的笼罩之下。虽然两个阶段的中国农经学科都是在国外知识体系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但是，第二个阶段的中国农经学科受国外的影响更大。在第一阶段，虽然国内学术界在模仿苏联农业经济学研究，但是对苏联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具体实践及其教条化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多有批判，并且开展了

^①资料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方网站上的“1203 农林经济管理”条目，<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三农”现实进行理论提炼的初步尝试，只不过这种尝试因为缺乏合适的学理框架指引和具体的分析工具支撑而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而在第二阶段，国内学术界针对西方农经^①的引进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基本是将其从概念到分析框架、再到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的整套体系，乃至研究议程和研究旨趣，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引进中国。对西方农经的引进，更多地不是为了服务自主的理论创新，而是一种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方式。在这一阶段，中国农经学科的大量研究，体现为用中国“三农”实践中的经验素材去迎合西方农经的研究议程、验证西方农经的理论预设、展示西方农经的方法威力。此外，在具体的学科建设和知识再生产层面，中国农经学科也全面接受了西方农经学科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能够发表在西方农经顶级期刊上、为西方学术界所接受的研究，被认为是好的研究。国内一流期刊在主题筛选和方法评判上，也展现与西方期刊接轨的趋势。可以说，西方农经及其知识体系对于当前中国农经学科这种全方位的影响，是第一阶段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研体系从未达到的。

（二）西方农经研究的价值与局限

如何评价中国农经学科对于西方农经研究的引进和追随？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要对西方农经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局限作出客观评价。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西方农经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内核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突出特征有三项：其一，在概念体系的建构上，秉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Hodgson, 2007；那艺和贺京同, 2019），即以人类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作为建立概念的优先层次，将其作为微观基础扩展到考察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主要是博弈行为）和关于资源配置的社会安排。其二，在社会结构层面，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主要围绕市场这个单一范畴展开分析（Stanfield et al., 2006）。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重点考察、形成系统理论的是市场这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对于市场之外的范畴，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也往往是通过“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如何成为可能”的视角来考虑的（Stiglitz, 1989）。换言之，其他范畴在逻辑上从属于、派生于、辅助于市场范畴。其三，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倾向以数理模型的形式建立理论，以量化分析的方式展开实证研究。尤其是，随着实证研究领域“可信性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兴起，因果推断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逐渐成为广为接受的实证研究范式（罗玉辉和张志, 2024）。

一旦明确了西方农经所继受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这些核心特征，就可以清楚地揭示西方农经的学理价值和局限。从学理价值的角度看，首先，作为概念基础的理性选择框架与数理建模方式相配合，

^①本文提及的西方农经，指的是遵循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主流农经界所设定的研究议程，以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为基础所开展的一系列涉农社会科学研究。因此，西方农经中的西方，并非简单的地理或文化概念，而是特指那些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假设，具有相似研究议程、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涉农社会科学研究的集合。关于本文所指的西方农经的学科发展脉络和主要特征，以及与其他学科如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可参见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AAEA）四位前主席在2024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Mittelhammer et al., 2024）。关于西方农经的研究议程和理论观点的发展演变，可参见“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https://www.sciencedirect.com/handbook/handbook-of-agricultural-economics/volumes>）。关于西方农经的政策主张，可参见Just（2023）的综述性文章。

使西方农经可以针对社会经济主体的各类选择与决策机制展开充分分析，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的研究范围。其次，重视以计量经济学的方式开展实证研究，使西方农经拥有针对经验对象之间“量的相互关系”的强大分析能力，可以挖掘质性分析和案例分析无法呈现的经验现象与特征事实。最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内核，西方农经学科具备逻辑清晰的市场理论，对市场机制的基本内涵有深入洞察。

然而，就像辩证法所提醒的那样，西方农经所具有的这些优势，也恰恰成为其局限性的来源。一方面，因为以个体决策者的选择行为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以发掘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基本的实证框架，西方农经在拓展研究范围的同时，也陷入“过度一般化”与“中层概念不足”的双重困境。实际上，社会存在和经验事实具有层次性，并非所有社会存在都可以还原到个体决策者层面的选择行为和行动。强调个体本位的概念，优势是具有足够的一般性，因为任何社会存在、任何社会事实总会涉及个体的选择行为，学者总可以据此展开研究。但是，这种高度形式化的分析框架，未必正好把握经验对象的本质属性和本质逻辑。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给予了西方农经研究足够的关于个体决策和个体间博弈的概念，但是，超出个体层面、可以对更高层面的经验事实进行把握的“中层概念”却存在系统性不足——归根结底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高度形式化排除了这些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因果推断的计量分析同样成为一种“纯形式”——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判明何种因果关系，最为倚重的是概念和理论的指引。对此，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同样缺乏足够的概念与理论支撑，从而基本交给学者的经验主义，以及更加模糊的学术圈的“品味”来判断。这样的局限性，不只体现在西方农经上，在发展经济学上也非常明显。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基本完成了微观转向，基本上从个体本位出发重塑了学科。于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变成了一门用因果推断的计量经济学来研究“穷人的边际决策如何改进”的学问，基本放弃了微观个体决策之上的概念创新。一些敏锐的观察者由此察觉到，这其实放弃了属于发展经济学特有的概念体系，从而预示着“发展经济学的终结”（Kanbur, 2024）。西方农经其实也面临类似的处境。

另一方面，因为西方农经继受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对于市场范畴的单一关注，从社会结构层面，它所能捕捉的就是市场这一单一对象。这就使西方农经在这一层次上的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它更适用于那些各类市场完备、农业是接入市场的一个产业部门、农村是市场覆盖下的一个区域、农民是某一产业部门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的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源禀赋较为优越、从而有利于市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的发达国家。毋庸置疑，符合这些特点、最为典型的国家就是美国——它同时也是当今国际上农经研究“最前沿”的国家，是各国农经研究学术界学习的对象。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在现实中，市场很难作为单一用以洞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最为关键的范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市场理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愈演愈烈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使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披上了“科学主义”的外衣，也在农业领域中主导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这些改革的后果是，在一些农业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本国农业资源成为国际资本巨头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占取对象，导致大量本国农民缺乏赖以生存的资

源保障，社会矛盾尖锐；在另外一些农业资源禀赋较差的国家，政府大幅弱化了其本来承担的粮食供给保障职能，将其交给所谓不受干预的自由粮食市场，然而，当国际粮食价格大幅波动时，该国立刻陷入粮食危机。显然，这样的指导理念，未能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生存、发展、现代化”的目标。

（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农经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西方农经的上述学理价值与局限，使中国农经学科在全面引进其研究范式和评价体系时，也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矛盾境地。从积极方面看，西方农经研究范式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农经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工具方法的前沿性，使中国农经学科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在培养学生、建设研究梯队、承担课题、出版著作教材，以及在国内外一流期刊发表文献上均展现日新月异的进步。从消极方面看，引进西方农经并未在把握中国“三农”发展的系统性特征和提炼中国“三农”实践的理论内涵上给予中国农经学科有效的帮助。时至今日，虽然中国“三农”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究竟中国做对了什么？有什么系统性的理论叙事能够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国经验成功的原因？沿着上述西方农经的研究范式，学术界无法全面、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西方农经的评价体系也被国内引进，其研究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意识，那么，国内学术界就必须考虑，当西方农经发生转型时，中国农经学科将何去何从。一个尖锐的事实是，作为西方农经研究最前沿的美国，大量高校的农业经济学在近20年来转型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或农商管理学，相关院系要么转为应用经济学系，要么转入商学院，逐渐失去了涉农属性。这样的转型其实和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密切相关。这引发的问题是，长期追随西方农经的中国农经界，是否也要随之转型？显然，在刚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尚未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仍未建成农业强国的今天，中国远不像美国那样可以将农经学科的研究对象化约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问题或农商管理学问题。“作为有着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十三亿多人口、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农村人口还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即使城镇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也还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是社会矛盾和挑战集中体现的一个领域，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始终具有全局重要性。作为“三农”研究的主要力量，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农经学科依然肩负重大责任，而且到了不能再通过简单引进西方农经教研范式、遵循西方农经研究议程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时候。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未像当前这样成为中国农经学术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为了回应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需要，应当在农经学科已有积淀的基础上，倡导建构三农学。三农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回答农经学科通过引进西方农经研究范式依然未能回答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三农”实践的典型经验究竟应如何概括，其蕴含的系统性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三农学还要澄清，中国“三农”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三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究竟是怎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农”实践的历史方位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页。

究竟是什么。通过落实和践行“两个结合”，建立学理逻辑坚实、学理体系清晰的三农学，可以促进农经学科新的发展，进而推动农经学科肩负起新征程上的历史重任。

三、什么是三农学：学理内涵与关键特征

三农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的“三农”历史与现实关涉为导向，系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所关联统摄的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论框架体系。该理论框架体系将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实践的理论逻辑，总结中国“三农”实践的成功经验，形成“三农”发展的中国主张。

（一）三农学的关键特征

区别于西方农经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三农学具有三项关键特征。

第一项关键特征是，三农学认为，在社会结构层面的概念与理论上，应突破西方农经聚焦于市场这一单一范畴的局限，围绕生产方式、财产权利、市场、区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七个核心范畴，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与理论，对中国“三农”实践的典型经验进行理论提炼。

这七个范畴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续和运行的基本前提。从特定生产方式出发，人与人之间围绕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成财产关系、财产权利。基于财产权利体系，不同主体对其拥有的产品和要素进行交易，从而形成了市场。依照物质生产的不同内容、主体参与市场时的不同角色，又形成区域分工、区域关系。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常需要介入调节物质生产、规制市场和协调区域关系，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循环顺畅，由此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的生产生活，归根结底依赖于自然环境与资源，这就派生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地理大发现以来，各个国家愈发嵌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愈发受到世界市场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本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七个范畴，每一个都刻画了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分析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基本参照系。

三农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更加完备的范畴体系，可以形成关于中国“三农”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总结。三农学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三农”实践的突出经验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在生产方式方面，基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农情与以土地细碎化为核心特征的农业生产条件，形成了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新型经营主体、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小农户相协同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将现代化的要素、基础设施和技术引入乡村，极大地拓展了包括小农户在内的农村各类经营主体所能利用的现代物质条件。二是在财产权利方面，形成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的制度安排，既以基本制度的形式确保了农民权益，又通过保留集体所有权权属和开辟经营权流转空间，为发展超越小农户层面的社会生产力创造了适合的产权形式。三是在市场方面，形成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相联结的可行方式；建立了市场导向的现代农业农村产业体系；拓展了全国范围的农产品市场和农民劳动力市场，激发了农民家庭所能利用的市场资源的规模和潜力。四是在区域方面，探索通过城乡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协同一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五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国家主导的、覆盖广大小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了国家力量与基层能动性相结合、结构转型与微观改进相结合的乡村发展模式。六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确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方向。七是在本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坚持保护国内耕地资源、立足国内生产能力、建立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同时积极稳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

三农学的上述理论概括具有明确的逻辑主线：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在于利用现代化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推动传统小农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形成有利于“三农”领域实现社会化协作、高水平分工与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发展路径，形成与之匹配、相互支撑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形成这样的理论概括，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三农”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明确落实与践行。三农学展开分析的上述范畴体系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并不是对其进行教条化的应用，而是作为一种指引概念生成和理论提炼的逻辑与分析框架。

第二项关键特征是，三农学主张突破西方农经缺乏历史维度的局限，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的理论为指导，针对中国“三农”变迁的历史脉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农”实践的历史方位与阶段性特征展开研究。

前文针对西方农经及其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核的分析已经揭示，西方农经基本上是一个超历史的、形式化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具有“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学理价值，但是却无力揭示中国“三农”历史脉络和明确“三农”实践的历史方位。这是西方农经的重大缺陷，也给过去中国农经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不理解历史，无以对现实形成深刻洞见。研究“三农”历史，理解上述七个范畴的具体内涵在长时段之中的演化变迁，具有重要价值。而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农”实践的历史方位，尤其是面向“第二个百年”，明确新发展阶段“三农”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对于指导实践、推动问题导向的理论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①在西方农经研究范式的主导下，对历史变迁和历史方位的研究已经基本从农经学科中消失了。而三农学必须明确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加以推动。

三农学涵纳历史维度的学术研究，是对“第二个结合”的落实与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的理论，对于洞悉中国“三农”变迁的历史脉络与“三农”实践的历史方位，具有指导意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紧密依存于中华农耕文明而存在的历史事实，则为“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条件。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农业生产、灾荒救济、农食管理、乡村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智慧经验，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重农思想和以农为本思想，对启蒙时代的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

^①习近平，2021：《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第9期，第4-18页。

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中国“三农”实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任务。将三农学明确纳入历史维度，有利于把握农耕文明的变迁过程，更加清楚地理解中国传统“三农”社会现代转型面临的突出挑战，进而更加深刻地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兴农、振兴乡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注重历史维度，而非脱离历史去探讨抽象的、形式化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项关键特征是，三农学的学理体系不同于西方农经的扁平化，具有明确的层次性。三农学的学理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的学理内容，即结构层次、历史层次与机制层次。

结构层次的学理内容是围绕七个核心范畴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这一层次的学理内容，正对应前述三农学的第一项关键特征。历史层次的学理内容是对中国“三农”历史变迁与“三农”实践历史方位的理论提炼与概括。这一层次的学理内容，对应的是三农学的第二项关键特征。机制层次的学理内容是支撑结构层次与历史层次学理内容的具体机制分析，如因素之间的因果关联和作用渠道、主体的决策以及主体间博弈、引导资源配置的均衡机制等。这一层次的学理内容，则与当前农经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相兼容。三农学的理论创新创造，主要体现在结构层次与历史层次上。相较之下，西方农经的局限恰恰根源于其学理体系的扁平化——仅聚焦于机制层次，而缺乏结构层次与历史层次。三农学并不排斥机制层次的研究。结构层次与历史层次的理论创新，正是需要建立在大量机制层次研究的支撑之上。

不同层次的学理内容对应不同的研究范式。结构层次和历史层次的学理内容，其研究范式主要是理论和思想的创新创造，进行比较历史分析，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炼，以及对理论体系的构造进行反思和整理——这接近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的研究范式（默顿，2008）与波兰尼倡导的“实体主义”传统的研究范式（Polanyi, 1977）。机制层次的研究范式主要是机制分析所需要的实证与模型研究，与当前农经学科的研究范式具有一致性。农经学科所采用的计量分析、数理模型、数值模拟等形式化方法，以及田野调查、案例研究等质性方法，乃至已经形成的较为稳健的基础概念和分析框架，可直接援用。三农学所具备的结构、历史与机制三个层次的学理内容及相应的研究范式，并非相互隔离或简单并列，而是具有相互启发、相互支撑的生动关联，是有机结合的整体。学理内容和研究范式的层次性、多元性，而非扁平性、单一性，恰是三农学未来发展的潜力来源。

（二）三农学视角下的“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的联系与区别

之所以将具有上述三项鲜明特征的这样一门学问叫作三农学，是因为“三农”既反映了这门学问所根植的社会存在领域，又是一个体现中国知识自主性的标识性概念。

需要指出，三农学视角下的“三农”概念，与学术界常提到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缩写）有所区别。“三农”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首先兴起于政策界的一个术语，用来集中概括在那个阶段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领域所涌现的一系列难点、堵点——如粮食生产徘徊、农民负担激增、公共事业滑坡、农民收入停滞等（温铁军，2004）。而步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落实，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最初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已不复存在。不过，“三农”问题这一术语因其鲜活性和概括性，一直在政策界沿用下来，也为学术界所普遍使用，在一个更宽的含义上，用来泛指农业、农村、农民领域中具有实践与理论探索价值的经验对象^①。

与“三农”问题这一通过简单并列关系形成、具有鲜明政策领域起源色彩的术语相比，“三农”是一个学理性的概念，是对社会某一本质性存在域的提炼与概括（贾俊民和葛文光，2013）。在三农学的视角下，“三农”是一个从生产方式、财产权利、市场、区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七个维度将农业、农村、农民三个简单范畴进行综合而形成的整体性范畴，是一种枢纽性的社会关联。“三农”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整体性功能，而且是洞悉与捕捉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的关键参照点。倡导三农学，也有利于更加系统地梳理“三农”问题的内在逻辑关联，澄清其政策内容与学术含义之间的交叠与张力。

四、三农学的关键作用：引导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三农学不是要替代农经学科，而是要以系统理论框架启发研究视角、以中国“三农”关涉设置研究议程，引导农经学科走向有意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

在笔者看来，三农学的构建并非以推翻现有农经学科体系为目的，也不存在与农村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发展学、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的替代关系，而是尝试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总结、梳理并理论化中国“三农”发展的实践经验。

具体来说，三农学与农村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发展学、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是兼容、协同关系。其一，在实践层面，三农学与这些学科具有相似性，都强调中国实践经验对于提炼理论的突出作用；其二，在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及其涵盖范围上，三农学强调从七大范畴出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解释中国“三农”实践经验的理论框架体系，与这些学科具有差异的同时也形成互补；其三，在采用的研究范式上，三农学反对仅采取单一范式开展研究，强调研究范式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并需要和不同的理论层次形成适配，与这些学科也具有相似之处。

三农学和农经学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与现有经济学体系的关系^②。新结构经济学同样并非替代现有经济学体系，而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视角，力求弥补现有经济学体系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三农学也是如此。笔者认为，三农学是属于农经学科之内的一门学问，在未来将作为农经学科体系内部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发展活力的部分而存在。

首先，三农学结构层次与历史层次的学理内容，可以成为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来源。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问题导向的中国实践出发，形成兼具

^①一些学者指出“三农”问题这一术语的内涵缺乏严密的学理逻辑（叶敬忠，2018），而这也正是笔者倡导从“三农”问题走向具有坚实学理逻辑和理论体系的三农学的一个原因。

^②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核心理念的介绍，参见 Lin（2011）。

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当前农经学科经由西方农经而继受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对应三农学学理体系的机制层次，重视的是决策者的最优化分析、决策者之间的博弈分析，以及市场经济的均衡分析。这一层次的学理内容，对于建立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具有支撑作用，但这并不是其主要的创造性来源。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历史的系统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则不具备这样的指引功能。三农学建立结构层次和历史层次的学理内容，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完备的范畴体系，对中国“三农”实践与历史变迁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与提炼，实际上是填补了当前农经学科的一个空白。结构层次和历史层次的学理内容，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干。这两个层次学理内容的存在，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中国历史的传承，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与人类社会深层共性逻辑的紧密联系，也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三农”发展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

其次，三农学具有引导农经学研究议程设置的功能。这也是建构三农学的重要考量。中国农经学科引进西方农经所导致的确立自主研究议程能力弱化，是三农学需要应对的关键挑战。三农学将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发展原创性理论的攻关目标聚焦于中国“三农”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以及梳理中国“三农”历史变迁与“三农”实践的历史方位，发挥的正是将已有农经研究“点”状的知识汇聚成“面”、提炼出“主线”的研究议程引导功能。三农学提炼概括中国“三农”变迁历史特征和“三农”实践历史方位，需要以充分的机制分析为支撑。农经学科已有的模型、方法和工具，恰是完成这些机制分析的最好抓手。通过这样的引导功能，三农学可以将农经学科的发展导入支撑自主理论创新的轨道上来，而非盲目将学术资源投入追随西方农经那些与中国实际不相符、不具有中国现实意义的“研究热点”。依托于三农学具有明确范畴体系的理论框架，原本分散于农经学科诸分支的研究主题，也可以被纳入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这就为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最后，三农学可以推动农经学科问题导向的政策研究进一步形成自主的理论创新。中国农经学科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政策研究。紧密联系政策是农经学科的优势，也是扎根中国大地、重视中国“三农”实践的体现。但是，政策研究需要进一步往自主理论创新的方向跃升，而不是在政策术语体系中循环往复。当前农经学科所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对政策的理解以及分析，主要是从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干预的妥当性这一角度入手的。中国“三农”政策实践，就其丰富性和创造性而言，其实远超出这一理论视角的涵盖范围，从而无法在当前农经学科的理论架构下得到系统的总结与升华。“三农”政策是中国实践经验在“三农”领域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典型代表。对其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应当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是自主的概念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农经学科现有理论框架具有上述结构性约束，从政策实践到理论创新的通道存在堵点。三农学建立的结构层次的学理内容，通过七个范畴构成的系统理论框架，可以为阐明“三农”政策的意涵提供更加宽广深刻的理论视角，从而畅通政策分析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连接渠道，使之相互印证、相互启发，助力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任务。“三农”涉及社会科学诸

多方面,天然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的视野,也自然而然地为创新概念理论、梳理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发。“三农”又是厚植于中国传统的领域。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动力在这里相互作用。作为“三农”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农经学者应责无旁贷去做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锋。通过倡导与建构三农学,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将步入动能更加充盈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冯仕政,2022:《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社会》第6期,第14-31页。
- 2.高培勇、魏后凯、何秀荣、青平、姜长云、周应恒,2024:《加快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2-22页。
- 3.贾俊民、葛文光,2013:《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第86-94页。
- 4.罗玉辉,张志,2024:《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近了?——以自然实验和可信性革命为例》,《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第176-202页。
- 5.默顿,2008:《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50-53页。
- 6.那艺,贺京同,2019:《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60-77页。
- 7.孙圣民,2023:《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本土化——兼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构建》,《经济研究》第12期,第185-202页。
- 8.孙正聿,202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22-27页。
- 9.温铁军,2004:《“三农”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学理论》第9期,第8页。
- 10.叶敬忠,2018:《“三农问题”: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东南学术》第5期,第112-123页。
- 11.Hodgson, G. M., 2007, “Meaning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4(2): 211-226.
- 12.Just, D. R., 2023, “On the Policy Releva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0(4): 1256-1276.
- 13.Kanbur, R., 2024, “The En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end-development-economics>.
- 14.Lin, J. Y.,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2): 193-221.
- 15.Mittelhammer, R. C., B. K. Goodwin, J. J. McCluskey, and D. Zilberman, 2024, “Whither Goeth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46(3): 865-888.
- 16.Polanyi, K., 1977, *The Livelihood of M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20.
- 17.Stanfield, J. R., M. C. Carroll, and M. V. Wrenn, 2006, “Karl Polanyi on the Limitations of Formalism in Economics”, in D. Wood (ed.), *Choice in Economic Contexts*, Kidlington, UK: Emerald Group, 241-266.
- 18.Stiglitz, J. E., 1989, “Markets, Market Failures,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2): 197-203.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rough Sannongology

ZHU Xinkai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the paradigmatic experience of Sanno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evelopment has increasingly crystallized, with their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gaining heightened salience. This context ren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a timely imperative. Confronted by the challenges of fragmented research agenda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the under-theorized, un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mpirical achievem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Sannongology emerges as a viable pathway to address these deficiencies, unveil the intrinsic logic of China's praxis, and thereby forge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Sannongology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rientated toward China'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of Sannong.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along with their transformations—governed and interconnected by agricultur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livelihoods. This framework aims to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underlying Sannong practices within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jectory, synthesi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s Sannong endeavors, and articulate a distinctly Chinese perspective on Sannong development. Sannong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pivotal features. First, it establish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categorical system rooted in Marxist principles, formulating systematic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abou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Sannong development. Second, i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which often lacks historical depth, by incorporating studies on social formations,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dynamics of change, thereby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China's Sannong progress. Third, it emphasiz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nhance compatibility with and assimilation of valuable insights from diverse research paradigms.

Sannongology does not seek to supplan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but rather aims to inspi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rough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guide the research agenda setting based on China's Sannong-related concerns, thereby steering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oward the conscious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uctur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in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Sannongology could serve as a creative fountainhead for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econd, Sannongology possesses the capacity to direct the research agenda formulation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reby reinstituting Chinese intellectual autonomy in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inally, Sannongology may propel policy-oriented, problem-driven 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oward developing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Keywords: Sannongolog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ategorical System; Theoretical Hierarchy

JEL Classification: Q15; O13; P16

(责任编辑: 柳 荻)